

空间的隐喻：《帝鉴图说》文化意象的叙事性展示设计研究

张雨苗 赵川

河北科技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00

【摘要】：空间叙事的理论框架为空间设计的展示方式提供了一个从物品展示转向人的实际体验的新视角。本研究以明代的帝王启蒙文献《帝鉴图说》为核心，深入探索了该文献在现代展示空间设计中的叙事策略。通过对《帝鉴图说》中“左图右史”这一图文叙述特点以及其所隐含的儒家政治道德观念的深入分析，从感知、认知和认同这三个叙事维度出发，提出了一个“物象转译—场景重构—仪式生成”的综合设计路径。研究指出，《帝鉴图说》的展示空间应该不仅仅局限于对古籍实物的静态保护，而是应该构建一个可以感知、可以进入、可以认同的叙事场域，这样可以使传统的政治智慧在当前的语境中得到活化和传承。

【关键词】：空间叙事；帝鉴图说；展示空间设计；图文叙事；沉浸体验

DOI:10.12417/3041-0630.26.04.080

《帝鉴图说》这本书是明代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为年轻的皇帝朱翊钧所编写的启蒙读物。书中精选了“圣哲芳规”的81个事件和“狂愚蹈覆辙”的36个事件，通过“左图右史”的叙述方式，深入探讨了历代帝王在治理国家时的得失。这本图文结合的教材，不只是承载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教诲，更是通过其独特的图文互文结构，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叙事的经典文本。当一本古籍被引入到现代展览空间时，设计师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如何保护和展示古籍的实物，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智慧和价值观念传达给现代观众。空间叙事理论的出现为解决这一复杂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从20世纪末开始，“叙事转向”在人文社科领域广泛传播，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从文学作品扩展到了博物馆展览和展示空间设计等多个实际应用场景。空间叙事的核心思想是利用三维空间媒介来描述二维的时间活动，从而在空间里对展品、事件和历史行为进行重新组织和展示。对《帝鉴图说》这本书来说，空间叙事是将其图文内容“转译”为一种可以移动和感知的空间体验。这样，观众可以在身体的移动和感官的沉浸中，深入理解古代帝王教育的核心理念，并最终形成对中华政治智慧的文化认同。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空间叙事理论如何与《帝鉴图说》的文本特性相结合？在展示空间设计中，应当构建怎样的叙事维度与设计策略？通过这一研究，以期为古籍类文化遗产的当代展示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1 空间叙事理论及其展示设计维度

1.1 从文学叙事到空间叙事

叙事，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思维和表达活动。罗兰·巴特曾言，叙事存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就像人生”。传统叙事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时间序列上，注重故事情节结构和叙述技巧。然而，在叙事学和空间理论遭遇时，“空间叙事”的概念也渐渐浮现出来。

空间不只是故事的语境，其本身也就是一种叙事功能。龙迪勇认为叙事学研究中的“空间转向”，引发了学者们对空间之于叙事建构的正面影响的重视。陆邵明更进一步地提出了空间叙事所涉及到的空间化叙事技巧和空间叙事功能，并通过地点的形式，关系和顺序等因素形成了叙事的复合形式。从展示空间上看，它意味着所有空间要素如展厅流线组织，场景营造，光影变化和材质选择都可作为叙事语言。

1.2 展示空间中的叙事三要素

将叙事学理论应用于陈列空间的设计中，可以归纳为“人一展品”“情节—逻辑”“环境—空间”三大核心元素。这三个部分共同组成了叙述的基本框架。展览中的“人物”具有叙述性。《帝鉴图说》以古籍原件、相关实物和图文复制品为主体，呈现出一种以文字为主体的叙述方式。但是，区别于传统的展览，展览中的展览物品并非孤立的物品，而是镶嵌在空间情境中的叙述要素。逻辑就是“情节”的叙述。展览空间必须要有明确的叙述主线，才能让参观者了解展览物品间的关系，了解事件的前因后果。《帝鉴图说》117条故事自身存在着时空次序和价值差异，从而构成了一种空间叙述的内部结构。“环境”是一个叙述性的空间气氛。灯光，颜色，材料，尺度，声音等要素，可以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空间知觉，并对观者的情感和解读产生影响。例如，表现“圣哲芳规”的空间可以采用明亮、开阔的设计语言，而“狂愚覆辙”则可借助幽暗、压抑的氛围传达警示意味。

1.3 感知—认知—认同：空间叙事的三重维度

在对非遗展示、红色文化展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知觉”“认知”和“认同”三个维度。（1）知觉维度与“物”层次相对应，侧重于多种感觉的刺激；观众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来感知空间。在这个层面上，设计师要充分利用材料、光、声等要素，营造出一种丰富的感受。（2）认知维度与“景”层次相对应，侧重于对情景的认

识构建。观者随着画面的不断再现，在空间的运动中，逐渐体会到展览内容背后的内在逻辑。在这种尺度下，设计师要认真安排好空间的顺序，使空间的起点和终点都能跟上故事的情节发展。（3）认同维度与“事”层次相对应，注重建立礼仪，激活价值身份。受众在体验了知觉和认识后，对所呈现的题材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在这种意义上，设计师需要营造出一种仪式感的空间结点，使观者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甚至成为“价值建构者”。

这三个层面不是直线前进的，它们在空间经验中互相交织，层层深入。在这一框架下，本文对《帝鉴图说》的文本特征进行了剖析，并对其在空间上的运用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2 《帝鉴图说》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潜力

2.1 “左图右史”：图文互文的叙事结构

“左图右史”的谋篇布局，是《帝鉴图说》最大的文本化特点。每个故事都配有插图，左边是图画，右边是说解。这一格式不是《帝鉴图说》所独创，它起源于中国古典书饰的传统，经过张居正的修撰，使其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叙述张力。图片的功能不仅仅是对文本进行直观的展示。《帝鉴图说》所绘的图画，多是以人物姿态、场景安排和细节描写等方式，选择故事情节中最有戏剧性的时刻，以增强其思想内涵。比如“碎七宝器”，描述的是宋太祖对前蜀国豪奢的破坏，画面中，太祖怒目而视，宝器破碎，侍从惊愕的表情，组成了一幅道德训诫的画面。文本具有完备的因果性和注释性，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这种图文互文的叙述方式对空间的设计有两方面的启发：一是通过空间来重现图形中的视觉场，使2D影像转换成3-D可接近的环境；同时，它还能模仿文本的叙事节奏，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受众进行“起承转合”的叙事感受。

2.2 空间化的叙事想象

《帝鉴图说》中的很多传说，都是以具体的时空为背景，如宫廷宫殿、长城、民间街道等。它既是一个故事的背景，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叙述。如以巴上兵营为“入关约法”，以宫中为“纳谏赐帛”为“纳谏赐帛”，以朝中为“撤殿营居”为主要内容。这些历史空间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代表着君臣次序的朝廷，代表着军威的兵营，和与民生苦难相关的平民之地。《帝鉴图说》的陈列设计，从空间叙述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历史空间的重现和转换，让观者“进入”到了故事发生的地方，并在感官上解读故事的含义。这与读书时的想象参与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具体的认识经验。

2.3 政治伦理的视觉化表达

《帝鉴图说》是一部以传播儒家政治道德为主要内容的帝王教材。“圣哲芳规”是明主楷模，而“狂愚覆辙”则是对昏君的警醒，两者之间的反差很大。这一反差极大地增强了建筑

的戏剧效果，同时也赋予了建筑空间的叙述紧张感。从空间叙述的视角来看，这一价值分化可以通过空间气氛的反差而得以加强。“芳规”的表达，可以采取开放、明快、有序的设计语言，体现出清明的政治空间形式；“覆辙”的展现，可以利用封闭、黑暗、混沌等要素，来隐喻昏庸的政治恶果。观者在这两个时空的交错中，透过对自身的感受，体会到“可资治鉴”的深层含义。

3 空间叙事视域下的展示设计策略

3.1 物象转译：从图像到空间的感知建构

《帝鉴图说》中的意象要素“转译”成了一种空间语言，这是一种意义上的“感性建构”。这种转译并非单纯地对影像进行复制、放大，而是将影像中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加以再表述，并加以抽象、夸张，使之具有隐喻性。以《帝鉴图说》的插图为例，其中反复出现的符号元素——龙椅、屏风、宫阙、礼器——都可以成为空间设计的母题。例如，序厅中可以设置一组抽象化的“屏风阵列”，屏风上以透雕或投影方式呈现书中经典插图，既点明展览主题，又暗示“左图右史”的叙事结构。屏风的半透明性还能创造隐约的窥视感，激发观众深入探索的欲望。

材料和光线的选择都涉及到知觉的构造。为了表现明皇宫的气氛，可以使用传统的木材、青砖、铜器等材料，但是要用现代的技术来表现；在灯光的运用上，我们可以参考中国国画中“留白”的思想，利用明暗对比，创造出一种丰富的光影效果。山东博物馆汉画像石展览的做法是有借鉴意义的：这次展览是把“方花”意象转译成了一种超越视觉体验的夸张形态，并用上挑的造型来模仿天空中的光线，让观者的精神空间和建筑空间产生共鸣。多感觉经验的介绍也是知觉构建的一种重要方法。在一些特殊的区域，还可根据影像内容，播放传统乐器如编钟、古琴等的乐曲；在有故事情节的场面里，还能隐隐约约地加入战鼓和马蹄声；也可以尝试用香味来设计，比如在展示皇宫宴会的情景时，用一种轻微的檀香木或者葡萄酒的香味。将这些感觉要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给受众带来更加丰富的视觉感受。

3.2 场景重构：叙事空间的认知建构

认知建构是空间叙事的第二重维度，其核心任务是通过空间序列的组织与典型场景的复原，帮助观众理解《帝鉴图说》的内在逻辑。这一过程涉及叙事节奏的控制、空间叙事的编排以及场景的具象化呈现。在空间序列的组织上，可以采用“总一分一总”的结构。序厅以抽象方式呈现《帝鉴图说》的整体面貌与历史背景；主体展厅分为“圣哲芳规”与“狂愚覆辙”两大板块，分别展示明君典范与昏君教训；尾厅则回归现实，探讨《帝鉴图说》对当代的启示意义。这种结构既符合认知规

律，又能形成叙事张力。

具体到空间叙事节奏，“圣哲芳规”板块可以采用螺旋上升的流线，随着参观进程，空间逐渐开阔、明亮，寓意善政的积极影响；“狂愚覆辙”板块则可以设计逐渐下沉的路径，空间愈发压抑、幽暗，暗示恶政的悲剧结局。观众在身体移动中，经历从希望到警示的情感起伏，从而加深对“可资治鉴”的理解。典型场景的复原是认知建构的重要手法。根据《帝鉴图说》的描述，可以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进行场景化再现。例如，“入关约法”可以复原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的军营场景；“纳谏赐帛”可以再现汉文帝接受进谏的朝堂画面；“碎七宝器”可以呈现宋太祖面对奢侈品的决绝姿态。这些场景不是简单的“蜡像式”复原，而是在考古依据基础上进行艺术化提炼，通过人物造型、道具陈设、背景绘画的综合运用，创造具有沉浸感的叙事空间。

对于无法完整复原的建筑场景，可以采用“解构式组合”的方法。例如，表现汉代宫殿时，可以提取斗拱、瓦当、柱础等典型构件，以当代构成手法进行重组，既传达历史信息，又保持现代审美。数字技术的介入可以进一步拓展场景复原的可能性——通过投影映射，可以在抽象空间表面呈现动态的历史画面；通过AR技术，观众用手机扫描特定位置即可看到复原后的建筑全貌。

3.3 仪式生成：文化认同的激活机制

空间叙事的最高维度是认同建构，其核心任务是引导观众从“文化旁观者”转变为“价值共建者”。这一转变需要通过仪式感的营造来实现。尾厅是仪式生成的关键空间。在这里，可以设计一处具有纪念性尺度的“鉴空间”——圆形或方形的大厅，四周墙壁以阴刻或阳刻方式呈现《帝鉴图说》中的经典名言。中央设置一方“鉴池”，水面如镜，倒映四周的文字与观众的影像。这一设计的寓意在于：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既是观镜者，也终将成为镜中人。观众在静默凝视中，完成与历史的对话，形成对“以史为鉴”这一理念的切身认同。

仪式感的营造还可以借助光影的戏剧性变化。在特定时间

点（如整点），展厅灯光渐暗，一束追光打在某一展品或场景上，配合旁白讲述，形成“剧场化”的观展时刻。这种手法打破常规观展节奏，制造神圣的仪式感，有助于强化观众的情感体验。互动装置的设置也能促进认同生成。在尾厅可以设置“今日之鉴”互动区，观众在触摸屏上写下自己对“以史为鉴”的理解，或对当代社会治理的思考。这些留言经过筛选，可以投影在“鉴空间”的墙壁上，使观众感受到个人思考与公共价值的连接。这种参与式的设计，使观众从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意义的共建者。

值得注意的是，仪式生成不是强制的情感灌输，而是通过空间氛围的营造，为观众提供自我反思与情感共鸣的契机。设计者应当保持克制，留出足够的“空白”，让观众在自由解读中获得个性化的认同体验。

4 结语

《帝鉴图说》的展示空间设计，本质上是对一部古代典籍的当代诠释。传统展示模式往往止步于“保护与陈列”，将古籍置于展柜中，辅以说明文字，观众只能隔着玻璃“观看”而无法“进入”。空间叙事理论为突破这一局限提供了可能。《帝鉴图说》的陈列空间布局，实际上是对古代典籍的一种现代诠释。传统的陈列模式还停留在“收藏与陈列”的层面，也就是将古籍存放于陈列柜中，并附有说明性文本，使游客既无法“进入”，又可以“观看”。“空间叙述”为突破这一局限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从感知建构到认知建构再到认同建构，空间叙事将《帝鉴图说》从静态的“物”转化为动态的“事”，从可读的文本转化为可游走的场域。在这一过程中，观众不再是历史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叙事的主动参与者。他们在空间移动中理解历史，在身体感知中形成认同，最终完成从“旁观者”到“价值共建者”的转变。从广义上讲，《帝鉴图说》一书的个案告诉我们：古书的现代价值，不只是因为它是一种罕见的材料，而是一种思想的传承。而空间叙述设计，则是一座沟通古代与现代的桥梁，使古代的智慧从书本中走出，走进现代人的生命空间，并在一次又一次的具象体验中，实现了文化的活态传承。

参考文献：

- [1] 三亚市博物馆.博物馆展览的空间叙事策略[J].博物馆管理,2025.
- [2] 文红宇,王诗娴,高英强.“感知、认知、认同”——基于空间叙事三重维度的非遗体验展厅设计研究[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5(10):90-92.
- [3] 黄宸莹.博物馆展览的空间叙事:问题、潜力与策略[J].东南文化,2023(5):175-182.
- [4] 陆邵明.当代建筑叙事学的本体建构——叙事视野下的空间特征、方法及其对创新教育的启示[J].建筑学报,2010(4):1-7.
- [5] 龙迪勇.叙事学研究的空间转向[J].江西社会科学,2006,26(10):61-72.
- [6] 国家自然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空间叙事设计探讨[EB/OL].2024-03-26.
- [7] 张俊竹.从空间叙事视角看叶剑英元帅生平事迹展陈设计[R].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者视野”讲座,2025.